

江苏启示录

■点睛

翁彪之死 与城市之生

5年了周洁的笑容里总有一丝忧郁。她的幸福，在2003年8月22日，画上了“休止符”。那天，丈夫翁彪以自焚的极端方式对抗南京市玄武区拆迁办的野蛮拆迁！翁彪自焚不仅给妻子留下了伤痛的记忆，更震惊了南京，震惊了全国！它直接促使南京，包括全国对整个城市建设理念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有什么理由为了城市发展去牺牲个人利益？

一年后，南京拆迁新政出台。这一政策出台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从“舍小家，为大家”到“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它甚至在全国上下引领了“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风潮。正是这一理念的深层变革，使得拆迁这个“城市第一难”变得不再难，使得2007年轰动一时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最终也在法律的轨道上得到圆满解决。

城市建设不仅需要规模、数量，更要宜居
拆迁不是市场行为，不是一套房子一笔钱那么简单
公权和私权，对立又统一

2003年8月，南京市民翁彪的绝望拉开了拆迁户自焚的序幕。紧随其后的是安徽农民朱正亮，只不过，朱正亮选择的自焚地点并非拆迁办，而是天安门。

人的生存不能没有家园，“翁彪们”同样如是。但他的家园毁于强制拆迁者之手。学者们说，财产权利

神圣不可侵犯。他与强权抗争，试图捍卫神圣，但却被“依法”侵犯。更不幸的是，抗争似乎徒劳无功。他过激地选择了自焚，生命，是他捍卫财产权的最后武器。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没有了恒产，他也没有了生活的信心；美国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曾说，“财产所有权是自由的保证”，他失去了财产，也失去了自由。

“正是有了国王也不敢侵犯的财产权的制度安排，才有了英国等西方世界的兴起。正是由于缺乏使穷人受益的产权制度安排和对这种财产权的进一步破

坏，中国在近现代才走向衰败，才引发了革命，才引发了改革。”刘军宁先生对历史的判断，今天读来何尝不是一样振聋发聩。

拆迁并无原罪，然而拆迁之中争执重重，拆迁之痛的背后是法律的滞后与理性的缺失，是对个体权利的漠视。拆迁制度必须改

革。钢刀清算失范时代英雄的征服法则，逐富时代我们需要的口含天宪良法在握。

良法之魂就是“以人为本”，“以民意为依托”。百姓维护私权，政府尊重私权，在市场经济时代这是一条基本准则。政府的强制拆

迁是一种行政行为，由于在

总体性的城市建设中很难由私权主体独立完成，公权的介入才成为一种必要。同样地，公权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对公权的放纵和放任，公权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城市房屋拆迁应遵循公权与私权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公权是私权的公共代

表，私权是公权的构成基础和具体的存在载体；另一方面，公权代表的公共利益有时又会与私权代表的私人利益发生冲突，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是强求私权“舍小家为大家”，还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小家”？

30年前，社会被行政所遮蔽，个人被集体所淹没，“

大家”凌驾于“小家”之上。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实质就是逐步释放“小家”及其所代表的个人和社会的制度性变革。只可惜，长期忽略社会建设和个人利益的传统管制模式并未能一次性退出历史舞台。乃至在寻回人的价值，树立“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过

程中，我们仍然要面临翁彪之死这样惨痛的教训。

惟愿翁彪之死能够成为“人本主义”的重生，惟愿翁彪之死催生的“尊重人的拆迁”能够继续生发。城市因人而生，也只有充满着人文关怀的城市，才有其“生”。

王琳（海南大学副教授）

翁彪之死 切换 城市发展理念

快报记者 钟晓敏 孙洁

打火机，就折回了拆迁办。

不满野蛮拆迁，他以自焚抗议

“12点半左右，我突然听到了救火龙（消防车）的警报声。”周洁说，当时旁边的住户也惊叫起来，“拆迁办失火了”。

下午1点左右，警察将周洁带进了新街口派出所。“一开始，做谈话笔录，后来就问我翁彪在南京还有什么亲戚。”周洁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果然，当天晚上警察告诉她：翁彪出事了，他在拆迁办公室用汽油“自焚”，还烧伤了拆迁办的其他6名人员，此刻正在医院抢救。周洁一下子蒙了。然而，未等她弄明白，警察将她安排到了同仁宾馆，并派人看守，“等于软禁了”。

“在出事之后，对我老公流传着很多说法，说他是无业游民，其实我老公是有单位的，他是汽轮电机厂下岗职工，下岗后我们一起做冷饮批发生意。”周洁说，老公翁彪平时为人老实厚道，并不偏激，如没受到刺激，不会做出自焚的过激行为。

周洁推测：翁彪在看到自己房屋被推倒之后，肯定怒气冲冲，冲到办公室之后，可能与拆迁办人员发生了争执，在愤怒中将汽油倒在身上，争吵不断升级，翁彪遂点火自焚。

“我们的房子，建筑面积20多个平方米，拆迁办给出的拆迁费是9万元，不够我们重新买一套房子。”周洁说，翁彪一直在与拆迁办协商，试图将拆迁费争取到10万元。

翁彪又提出第二套方案，要一套65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以解决住房问题。据周洁介绍，拆迁办当时的回答是：别做梦了。

22日11点15分左右，翁彪端了一盆酸菜鱼，拎着2只鸭头，还有一瓶啤酒回来，听周洁说拆迁办的人找他，他就赶紧过去了。“临走时，他叫我等他回面一起吃顿饭。”周洁说，她做梦也没想到，丈夫一去不复返。

“翁彪刚走几分钟，拆迁办的人便带来了一帮人，冲到我

家搬东西，还把我们家放在橱柜后面的一个给助力车加油的汽油桶拎走了。”周洁回忆，接着又冲进来几十个人，“那个场面就像电影里的鬼子进村一样，他们进屋后就把我公公拖出去，推倒在地。后来又像拎小鸡一样，掐着我的脖子把我拎了出去，当时我穿着睡衣、拖鞋，我说这样出去太难看了，请他们让我换一下衣服，有一个男的就扬手威胁我说‘你再不走老子就打死你’”。

公媳二人被拖到邓府巷小学旁，后来就被围在那里不准再走。“后来我就看到一个伸出像爪子一样的机器，几下就把我们的房顶掀掀起来了，还有推土机轰隆隆几下就把我们的房子推倒了。”周洁眼睁睁看着这一幕，无能为力。“房子眨眼就变成了废墟，东西都没来得及拿出来，床、信用卡、5000块现金，都被人家拿走了。”让周洁至今难以释怀的是，照相机不见了，与其一起消失的是里面存着的她和丈夫在中山陵的最后合影。

据邻居回忆，翁彪从拆迁办赶回家中，看到房子已被夷为平地，他大叫一声，转身拾起一个

临终惦记妻子：你们住哪里？

翁彪出事后，周洁及公公、儿子都被安排住进了同仁宾馆。周洁回忆，当时门口有一扇大铁门，铁门外有8名警察，每天24小时轮流看守。

“我们一家人吃住只准在那间屋子里，每天都有几双警惕的眼睛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周洁说，儿子当时还小，只有12



岁，他几次悄悄地问我：“妈妈，我们不是坐牢了？”

其间，有人代表拆迁办安慰周洁：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尽量满足。周洁的回答是：“我什么都不想要，只想看看丈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周洁说，当时玄武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翁彪的烧伤面积为98%，深度面积78%，伤级3级，医院正在全力进行抢救，每天费用高达1万元，且翁彪病情已有好转。

“如果有人活着，他们应该给我探视，我是他妻子呀。”周洁说，8月24日中午，她在再一轮争取探视丈夫未果的情况下，将丈夫的照片放大，买来翁彪当天没有吃到的酸菜鱼、啤酒等，在房屋废墟上搭建了一个简易灵堂。

8月25日上午9点多，周洁终于争取到了探视权，前往南京军区总医院探望翁彪。“我看到我们家翁彪的脸全部肿了起来，头发也没有了，手上裹着纱布，但露出来的手指、脚趾都是好好的，人是昏迷的。”周洁说，当时没来得及细看，就晕了过去。

8月27日，周洁第二次探望翁彪。他回忆，翁彪当时很清醒，见到她就问：“你们现在住在哪里？”由于他的气管被切开了，声音很微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周洁听了泪水不停地流，告诉她：“家里一切都好，住在病房里，儿子很乖，你放心。”翁彪点点头。

8月29日，周洁一家人经过很大努力，第三次被允许进医院看翁彪。“医生说，我们家翁

彪表现得很顽强，精神不错，想吃牛奶、馒头、榨菜、稀饭。”

后来，周洁的姐姐又帮周洁争取到了一次看翁彪的机会。

“那一次，翁彪见到我就流泪了，做出要写字的动作，我赶紧向护士要了一支笔给他，他在纸上写了让我今生恐怕都琢磨不透的六个字：手术没有签字。”周洁说，太遗憾了，她没来得及问他，就被陪她看翁彪的人拉出去了。

心里的迷惑越解不开，周洁就越想见到翁彪，9月4日下午，周洁用头往墙上撞，以死拼来的方法与翁彪见面的机会。“翁彪真可怜啊，他奄奄地躺在床上，眼睛没有神了。第二天下午，我接到翁彪病危及已经走了的消息，我感觉我的天塌了。”

5年了，孤儿寡母生活会了宽容

翁彪死后，相关部门给周洁一家，安排了一处65平方米的住处，另外给了26万元慰问金。这是翁彪自焚之前，周洁梦寐以求的，然而，得到它之后，她却多次想到了自杀。

那段时间，她每个星期三都提前去接儿子放学，顺便绕到邓府巷去看看，她甚至傻傻地想，“翁彪肯定在那里等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洁慢慢释怀了。她告诉记者，这一切多亏了儿子这个精神支柱！儿子本来就很乖，翁彪去世后，他更加懂事了。当时，年仅12岁的他，就常常鼓励周洁：“妈妈，你每天都要对着太阳微笑。”每年清明上坟时，儿子走在路上就会给她打预防针：“妈妈，我感觉爸爸一直

在我们身边，你千万别哭。”

儿子除了安慰周洁，在学习上也尽量不让母亲操心。如今他已上了一些重点高中，成绩十分棒。

现在，儿子已经长成了身高一米九几的大小伙了，越长越像父亲。周洁说，看到儿子她很欣慰。2005年5月，她在消沉一年半后，鼓起勇气找了份工作，用忙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

儿子还常跟周洁说：“妈妈，我们做人要学会换位思考。”“他的话也让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周洁说，有了这样的彻悟，心中就少了恨，人活得不没以前那么累，心里也压仰了。

逢年过节，她还会去邓府巷给翁彪烧点纸钱，“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悲伤了，更多的是怀念。”“我们家翁彪一个人的命，换来大家的幸福，相关部门在他死后，提高了拆迁补偿系数。”周洁说，这一点是她最欣慰的，她相信翁彪在天之灵，也会得到一些安慰。

【新政出台】翁彪悲剧不是简单发生的

“8月22日中午，我第一次和翁彪谈话，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近日，记者找到了玄武区拆迁办拆迁科科长丁小兵，他谈起翁彪的悲剧和南京拆迁新政的出台，感触良多。

丁小兵回忆了和翁彪最后一次谈话的情况：“谈到数额时，翁彪先要十万，但后来又说，‘就算你们肯给我十几万，给我一套经济适用房也没用了，我的家已经散了，什么都没有了！’”



见翁彪情绪突然变化，流露出对人生的绝望，丁小兵说：“我当时就问他，你有什么难处，相信我就说来听听，或许我能帮你。翁彪说了两个问题，一是他承包饭店欠了一百多万外债。二是他见不到儿子，可能当时家里有点矛盾。”

丁小兵回忆，谈话继续了半个小时，翁彪的老婆突然进来了，说：“房子都被人家扒了，还谈什么？”翁彪匆匆走了，丁小兵就到拆迁办的二楼吃饭了。当时12点多了，刚开始吃，就有电话过来了，叫了过去一下，结果到了现场，“原来是做坏事，正扒翁彪家的房子呢！”没想到，翁彪回家发现房子被拆了，又折回拆迁办的临时办公室，悲剧就此发生。

事业失败，家庭不和，这些说法和翁彪家人的说法不同。会不会是翁彪为了多拿钱把一些“问题”放大，以争取拆迁办的同情呢？“有可能，但当时几乎家家都如此，这或许也反映了补偿确实不到位吧！”拆迁人员承认了当时的补偿标准的确有问题。

操作层面有问题，更有深层原因

“拆迁事发第三天，有七八十户拆迁居民集体上访，邓府巷本来已经拆得只剩20多户，可觉得拿的钱太少，走了的人又找回来了！”丁小兵坦言：“我没法推卸责任，当时在操作层面确实出台，感触良多。”

丁小兵回忆了和翁彪最后一次谈话的情况：“谈到数额时，翁彪先要十万，但后来又说，‘就算你们肯给我十几万，给我一套经济适用房也没用了，我的家已经散了，什么都没有了！’”

有一家三口，夫妻俩没工作。非典时，他们一起当了消杀队员，不困难会去当消杀队员吗？那个女的每次来找我，穿的衣服上下身都不搭配，一看就是亲友给她的。她家的房子补偿款是5万，加上搬家费等一共是5.2万。”丁小兵说，“那女的提的要求是‘只要能给我买个单室套的经济适用房就可以了’。你说一家三口在一个偏远地方挤在一个单室套里，这要求高吗？我根本没法拒绝人家，可就按这个，那时单室套经济适用房是40m²，一平米1500元，也要6万元！她家还差8000元！我只好拍我的胸脯保证，我们两口子先去找工作！你们申购经济适用房，等到交钱的时候你们把赚来的钱一起加起来，钱还不够就来找我！”丁小兵说，后来他已经调到九华山项目去了，这家人买房最后还差6000元，找到拆迁办，他经别人承认有这个承诺，拆迁办出了这笔钱，“以前拆迁都搞补偿，拆迁办还是有些收入的。”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日期催得多紧啊！每逢拆迁，政府就要我们给他们报计划，几日日就要走多少户，下面的人给逼得不择手段。邓府巷就是这样逼回日期，逼狠了！”拆迁工作人员说。

“2003年、2004年当时南京房价上涨得多快啊，可203号令，就是老拆迁法里的补偿标准一直是往上调！”翁彪事件后，接任玄武区拆迁办主任的刘高和该办拆迁科科长丁小兵都这么认为。

实际上，翁彪事件之前南京就传出了拆迁政策要调整的风声。但邓府巷事件补偿低和工期紧两个原因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深层背景：当时南京很多工程都在快马加鞭干地。“政府需要钱搞城建，就要卖地，卖了地自然就要拆迁；而当时政府项目太多，预算不够，补偿标准一调，花的钱又要大大增加，于是就挨过这阵，等到大部分项目按老标准拆得差不多了以后再提高。”可这一拖就出问题了，“当时翁彪不出事也会有李彪、刘彪，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出问题已经是必然。”



重庆市杨家坪鸭兴路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这是网上流传的“史上最牛钉子户”。 CFP

毛1翁彪的家曾经就在这里。2003年的最后一天，翁彪的妻子走进这片废墟笑了起来。 本报资料图片

一家三口，夫妻俩没工作。非典时，他们一起当了消杀队员，不困难会去当消杀队员吗？那个女的每次来找我，穿的衣服上下身都不搭配，一看就是亲友给她的。她家的房子补偿款是5万，加上搬家费等一共是5.2万。”丁小兵说，“那女的提的要求是‘只要能给我买个单室套的经济适用房就可以了’。你说一家三口在一个偏远地方挤在一个单室套里，这要求高吗？我根本没法拒绝人家，可就按这个，那时单室套经济适用房是40m²，一平米1500元，也要6万元！她家还差8000元！我只好拍我的胸脯保证，我们两口子先去找工作！你们申购经济适用房，等到交钱的时候你们把赚来的钱一起加起来，钱还不够就来找我！”丁小兵说，后来他已经调到九华山项目去了，这家人买房最后还差6000元，找到拆迁办，他经别人承认有这个承诺，拆迁办出了这笔钱，“以前拆迁都搞补偿，拆迁办还是有些收入的。”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日期催得多紧啊！每逢拆迁，政府就要我们给他们报计划，几日日就要走多少户，下面的人给逼得不择手段。邓府巷就是这样逼回日期，逼狠了！”拆迁工作人员说。

“2003年、2004年当时南京房价上涨得多快啊，可203号令，就是老拆迁法里的补偿标准一直是往上调！”翁彪事件后，接任玄武区拆迁办主任的刘高和该办拆迁科科长丁小兵都这么认为。

翁彪之死推动拆迁新政出台

翁彪之死，直接导致了2003年8月22日之后，直到2004年2月1日拆迁新政出台之前，南京几乎所有拆迁项目全部暂停。

“那时候玄武区政府紧急派人下来，有负责安抚邓府巷上访群众的，有接待媒体的，还有监察组等等，我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调到了玄武区拆迁办当主任。”时任宁武拆迁公司总办的刘高告诉记者：当时他是负责离此不远的长江南北货项目拆迁，因其富有多年拆迁工作经验，所以被选来“堵枪眼”。

刘高一直就不赞同“拆迁是市场行为”的说法。“2004年前后，全国上下都说拆迁是市场行为，可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拆迁是政府行为，那不是一套房子一笔钱那么简单，它涉及老百姓的重大利益，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置身事外。”当年10月11日，刘高到玄武区拆迁办上任，当天就去了邓府巷现场。“当时院子

里都是上访居民，我12日就做了一件事，开门接待拆迁居民。”刘高说，“首先我们向被拆迁户检讨，然后我们听他们的呼声，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据他回忆，当时每天从早上8点半谈到下午5点，连续一周来了100多户拆迁户，晚上还要开会；后来人实在太多，他请求区里领导下来，分了5个房间接待居民，问题记录下来立刻向区里、市里汇报，基本一周之内答复居民。“那时真是开直通车，安置经济适用房的、工作有困难的各个部门都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最后该项目1600多户一共安置了500多套经济适用房，比例之高十分罕见。

10月份，刘高和丁小兵还接到了参加拆迁新政讨论的通知。丁小兵表示，虽说翁彪事件大大推动了新政的出台；而且还大大促进了新政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血的教训促使政府听了很多老百姓的呼声和我们拆迁一线操作者的建议。”

九华山连省领导的亲戚都顺利迁走

2004年2月1日，南京拆迁新政（227号令）在广泛听取了意见后出台。第一个项目选取九华山工程，令媒体和市民没想到的，负责的竟然是出了事的玄武区拆迁办。

“是我主动请缨的！”刘高告诉记者：他讲了三点理由：第一，玄武区拆迁办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第二，新政有优势，这个项目并不一定很难做；第三，我们有了新政操作的经验，掌握了最新情况，有利于妥善解决邓府巷的遗留问题。

“九华山可能是南京这么多年来拆得最好、几乎没有任何后遗症的项目！”丁小兵说，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居民说政策不对的少了！媒体高度关注，什么都公开透明，社会舆论从来没有这样有利于拆迁过！价格没问题，评估办法都是公开的；保障没问题，居民家确实困难的，政府有托底保障线；拆迁程序也没问题，听证、评估、裁决都有详细规定，操作起来有章可循，一定给老百姓申诉的机会，用制度保障居民的权益。

“当时老百姓就体现出坦诚的一面，虽然嘴上不说你好，可由于评估价不算低、操作公平、内心透明的人还是有！”

记者回访了一位九华山拆迁居民徐兵，她诉苦说，刚刚买了房子正装修就遇拆迁，照顾老人、孩子上学等生活计划被打乱。但她同时也表示“换位思考后，觉得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政策也公开透明”。最终，她选择支持国家建设，走了人。

九华山的拆迁还遇到一个问题，有一户居民是省领导的亲戚。“当时我们都觉得有点棘手，和该住户沟通，他既不提有这层关系，也不肯搬家。后来我

们一视同仁，他和多家住户一起被下达了拆迁裁决书。他没提任何架子，也没提过分要求就同意了。”省里的那位领导也未出面打过一声招呼。

以经济效益为第一考虑的领导少了

或许正是因为法规先进，操作者又端正了态度，改变了工作方法，严格依法办事，九华山拆迁工程原计划3个月拆完，结果56天就全部结束。刘高也从一个区拆迁办主任升到了玄武区房产局副局长。

丁小兵也感觉，自2003年的事件以来，领导们对拆迁的态度有根本性的转变。以前领导们一味看中经济效益，要求“用的票子越少越好，动作越快越好”；而现在是在“不出事的前提下争取票子少、动作快”，方面面保障居民利益。“这绝对是拆迁新政实施以来的进步。”

一位前前后后全程推动拆迁新政出台的政府官员婉拒了记者的采访，理由是“现在《物权法》出台了，那个2004年出台的拆迁新政应该又要按照《物权法》做修改了，现在正在等国家大拆迁法的出台，如果再沉溺于过往的业绩未免有作秀之嫌”。

不过他也表示：从翁彪事件到2004年的拆迁新政的出台，实际是我们城市发展的有些理念在变。“以前呼吁拆迁户舍小家为大家，现在不怎么提了，城市要搞建设也不能牺牲任何一户居民的利益！以人为本的理念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中逐渐深入人心”。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近日表示，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建设不仅需要规模、数量，更要宜居，这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城市建设上的体现。

“城市建设以人为本”在推动中前行

上面那位官员的上级当年也全程参与了拆迁新政的出台，记者找到他，他也不愿谈过时的“功绩”。因为在他看来，前面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比如就拆迁而言，现在居民的财产观念、房屋产权观念进一步强化，怎样确定适应这种形势的拆迁政策，解决土地和房子产权不一致的问题恐怕是当下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为有一个机制来确保能实现“以人为本”，这就牵涉政治体制中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标准改革。

就此，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如刚表示：政府对官员的考核以前就看GDP，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城市的生态环保和宜居程度，因为城市建设归根结底“是要让市民过得更幸福！”但这个幸福怎么保障是问题所在，它直接取决于政绩考核机制的改革。

30年 流行语录

1997年

下岗

1997年，全国共有1100多万职工下岗，“下岗”成为当年最具悲情色彩的流行语，也是许多人内心至今都无法平复的伤口。

郁闷

走极端的大学生是极少数，但他们的心理障碍在其他人身上也或多或少存在，这个当年高校最流行的词汇，也是至今都难以被淘汰的词汇。

有话好好说

出自张艺谋同名电影，对于面对世纪末躁动，神经越来越脆弱的人们来说，“有话好好说”是解决问题屡试不爽的百搭良方。

1998年

贺岁片

内地第一部贺岁片、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登场，中国终于有了跟国际大片较劲的电影。

扩大内需

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以及自1997年以来愈演愈烈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扩大内需”成为当年最响亮的经济口号。

网络那端，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互联网开始作为一种新的开放力量出现了，3家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网站都在这一年诞生：联众、腾讯、新浪。

1999年

黄金周，你要去哪里玩？

这一年，法定假日增加到114天，春节、“五一”和“十一”形成了休闲黄金周。黄金周休假制度，使中国人闲暇时间增多，旅游业风生水起。

最近比较烦

这首歌很脍炙人口，一提起调子人们都能哼几句，“唱得几千万周有人有事没事都开始烦，何况有人本来就烦。”

第一次亲密接触

痞子蔡掀起网络文学热，他在网上连载的这部小说打动了众多网民。同年，这本书出版，连续22个月稳居大陆畅销书排行榜。